

伦敦雾霾警示录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果能够思在行前,那就更好了



《大雾霾》
[澳]彼得·布林布科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1月

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名画《泰晤士河》，描画了水光氤氲、雾气朦胧的伦敦河道。世人以之为美，但事实上，画作除了说明莫奈的艺术追求，还隐现了当年伦敦的尴尬处境。所谓雾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霾”。

伦敦早在17世纪晚期就从德国旅行者那里得到了雾都的声誉。访客起初会因为大雾限制了他们观赏英国首都的景色而失望；但到了19世纪，许多访客却往往因为没有领略“伦敦特色”而感到失望。文学艺术是现实的投射，也是历史面貌的侧影。澳大利亚环境学家彼得·布林布科姆显然深谙这一点，科普作品如何做到既严谨又好读呢？不妨读读他的《大雾霾》。

这部书讲述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每一章都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所有数据表格和插图都注明了出处，同时在确切的历史记载之外，除了上述文艺界的“雾事”，我们还读到了许多有趣的“闲笔”。比如，埃莉诺王后心直口快地抱怨“好臭”，农夫为卖不出去的菠菜发愁，一些有意思的喜剧讽刺小品、谐趣诗歌，还有漫画中因为大雾迷路的行人的冷幽默。闲笔不闲，这些散落在书页之间的细节描述，牵引逝去的回忆，曾经以为雾很美，但是当雾成了“霾”，迷住我们的眼睛，刺激我们的心肺，吞噬我们的健康，我们就得需要冷静、理性思考造成这一切的缘由了。

空气污染古已有之，但在13世纪后英国人才开始关注其危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工业文明的账单不应以环境为代价，只是这一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何控制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当年有很多的投诉指向石灰工业，石灰生产的过程需要燃烧大量的煤炭，用煤量的快速增加，是造成伦敦空气污染的元凶。得出这个结论容易，解决起来却困难万分。我们现在都知道，劣质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极高，伦敦人当初并不知道，这是经过奥古斯都·沃克尔等人的反复调查论证才揭露的。苏格兰的无烟煤品质好，可惜价格高昂，长途运输更抬高了它的成本。经济利益是资本驱动的本能，与其指责资本的盲目性，不如想法创造经济与环保的共赢。

这其中还牵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约翰·伊夫林向国王和议会提交调查报告后，查理二世的态度模棱两可，王权、议会和教皇彼此之间矛盾激烈，在城市改建的大问题上，三方同样相互扯皮。不能把环保责任寄托在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上。即使到了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不还因她那本敲响滥用化学杀虫剂警钟的《寂静的春天》触犯了化工集团的利益而遭致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伦敦治霾进程就这样拖沓再拖沓，几个世纪都不见有什么大进展，直到1952年，那一场形同于世界末日的“大雾霾”给了伦敦人刻骨铭心的教训。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英国政府在1953年组建了由比佛爵士领导的委员会，专门调查雾霾事件的成因并制定应对方案。在比佛委员会的推动下，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首部空气污染治理法案《清洁空气法》。此后英国以铁腕治理环境，效果立显。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果能够思在行前，那就更好了。

林颐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伦理现实充斥在乌托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书间道



《重访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斯·赫胥黎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7月

这个标题我们再熟悉不过，尤其是那些正生活在中国父母温暖羽翼下的孩子们——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孩子们不得不压抑住自己哪怕再多的不快，被动接受父母安排的一切。

无独有偶，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伦理现实充斥在乌托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科学高效地安排了一切，从受精卵复制制到日常工作，从生活到娱乐。置身于这个社会里的所有人无需思考，无需担忧和悲伤，只需像孩子们那样，在“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预设程序里，机械地完成各个步骤。

小说中，那位唯一回归思考本能的约翰却被冠之以“野蛮人”的称号。他的所谓野蛮除了被身边人视为异端的思考能力外，还包括他并非出生于工厂里的流水线；他对大家津津乐道的麻醉品索麻越来越反感，并因此被驱逐；他以为远离象征科技进步的钢筋森林，就可以找回自我，没想到成为舆论嘲笑消费的焦点……在赫胥黎营造的这个乌托邦社会里，“幸福”早就成为一种教化模式。从胚胎起，人的思维便被科学格式化。

《美丽新世界》发表于1931年，15年后，赫胥黎结合刚刚落幕的二战，推出了《重访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认为他原来的诸多设想正在提前实现。他预言人口将会快速上涨，但他没料到刚进入21世纪全球人口就已迈入70亿大关。1996年7月5日，自人类首次克隆了那只名叫多利的哺乳动物后，猪、牛、猫、兔等被人类成功克隆的动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若不是因为伦理问题，克隆人也许早就诞生于实验室之中。赫胥黎在小说中反复提及的那种直升机，更像今天美国的鱼鹰飞机。而时下正在快速发展并令大批传统流水线工人失业的机器人技术正在成为现实。

赫胥黎没有说明的另一句话或是，科学发展纵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但往往受权力影响极大。迫于权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减少多样化以达到统一的过程”。《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官就曾毫不讳言，“为了不让你在生活受到任何感情的折磨，我们费尽了心思，只要有可能，就不让你们产生任何感情。”没有感情，就形同一台会呼吸的机器。另一个事实也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科学发展虽然迅速，但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做到均衡发展。相比之下，权力可能更愿意采用那些足以对社会形成足够震慑的暴力举措，以最为短平快的方式达成目的，给人类造成巨大伤痛，物质便是最好的例证。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从小在父母眼里的“小乖乖”，长大后常常因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而很难融入社会。倒不是鼓励孩子叛逆，而是一个独立思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独立的锻炼环境。另一方面，今天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物质富足不足以抵达精神的富足。

在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里，那些条件反射般复述“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的人，被科学阉割了思维的本能。他们所谓的幸福快感只能寄望于一定剂量的麻醉品——索麻。从这层意义上讲，在未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对人类真正构成困扰乃至威胁的，可能是你根本无法判断生活中到底什么是索麻。

禾刀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良心

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意『是否得体』，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好书我读



《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传》
[法]乔治·尼瓦
新星出版社
2016年8月

无论身处任何时代，总会有一些人肩负使命，负重前行，自觉地承担起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与自由的引领者的作用——对于俄罗斯而言，索尔仁尼琴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先知先觉者的角色。

从十八岁开始，索尔仁尼琴就是一位独立思考者。二战的爆发，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苏联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轨迹。战争爆发不久，索尔仁尼琴即应征入伍，先是在运输营当列兵，后因战功擢升，在炮兵营里担任声源侦察连连长。即便身处战争环境，索尔仁尼琴依然没有停止思考，他经常与知己好友就俄罗斯革命的命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受到军队反间谍机关的监视，最终遭到逮捕。在集中营的八年里，索尔仁尼琴当石瓦工，做苦力活，他非但不以为苦，反而将其视为磨砺个人意志的必经过程。

出狱之后的索尔仁尼琴开始了地下写作的历程，并终于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公开推出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无疑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时代，他不仅一夜成名，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发表成为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文学事件——他在小说里所传达出的战斗精神，那种发人深省、且令人振奋的声音，不仅让彼时俄罗斯人的生活出现了希望的曙光，而他本人亦以先知的形象留在他们心中，成为那个时代反抗专制、抵制奴役的一个鲜明的象征。

1960年代中期，索尔仁尼琴再度陷入困境。彼时的索尔仁尼琴已经做好了受难、甚至死亡的准备。他认为，为那些失忆或耳聋的现代入重新意识到人格的尊严而战，无疑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为此他愿意做一个殉道者。正是借助《古拉格群岛》的写作，索尔仁尼琴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待人和人类社会，帮助读者打开了他们被意识形态蒙蔽的双眼——既为活着的人，也为死去的人；既为叛徒，也为英雄——为所有那些自己无法述说的人。而索尔仁尼琴与苏联官方的冲突也愈演愈烈，1969年，他被苏联作家协会梁赞分会开除，1974年，他再次被捕，随即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在西方世界，索尔仁尼琴声誉日隆，然而，面对西方国家伸出的橄榄枝，索尔仁尼琴却并不领情。他一方面批评西方国家是一个“商业集市”，同样会碾碎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拒绝被不同的意识形态诠释，拒绝充当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作者乔治·尼瓦即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最大可能地揭示出索尔仁尼琴身上这种深刻而又有机矛盾，他说：“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意‘是否得体’，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由自己来评价一切事物的强大愿望，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考虑普遍公认的见解，是斗士的主要特征。”

乔治·尼瓦抱着同样的态度解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他将《古拉格群岛》看作是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调查、自白，以及各种证词的汇编；他将《牛犊顶橡树》看作是一部持不同政见者的编年史、一部斗士的日记……索尔仁尼琴其实是以文学的方式告诉后人，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体的生命，都存在真相，而作为一个作家，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有义务让世界了解一切，知道真相。

王淼